

國父「上李鴻章書」的研究

鄭亨榮

一、八十五年前的建國理想

想

國父的「上李鴻章書」是國民革命史上一個很重要的文獻，對國父革命思想的研究，是極富價值的。可是這一宗上書的事，在國父的著作和演講，甚至自傳裏都沒有明確的提及，因而引起一些人的疑揣，甚至有人懷疑「上李鴻章書」是否確出自國父的手筆，因此，研究國父思想的人，對這一文獻較少注意研究。

但是，「上李鴻章書」無疑是國父第一次提出的建國理想和方法，雖然當時國父的革命理論和三民主義思想還未成熟，但已在孕育中，在這萬言書裏，已看到國父對民生的重視和民生主義思想的萌芽。而在八十五年前，國父還祇是廿八歲的青年，便對救國建國提出這樣遠大的理想和具體的方法，是非常值得我們注意研究的，我們也祇有從這一文獻開始研究，才能瞭解國父革命思想發展的過程和它的全貌。

關於國父上李鴻章書的內容和所提出的救

國四大綱領，自然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但我覺得首先要研究的還是國父上書李鴻章的背景和經過，尤其關於這件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應該根據各項資料加以澄清，使大家對這一文獻有正確的認識。因此，本文願作此一嘗試，也就希望能引起大家對這一文獻的研究興趣，共同來闡揚和光大國父的革命思想。

二、發現的經過和最初的

記述

這一文獻雖在國父生前便會刊布，但並沒有引起大家的注意。它的發現是在國父逝世之後，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得陳援庵的指示，才在上海基督教廣學會的「萬國公報」上找到。最初的原文是刊登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和十月，萬國公報第六九及七〇兩號上，當時的標題是「上李傅相書」，並註明是廣東香山來稿。後來才陸續續續的在各種雜誌轉載，但標題則不一致；或稱「甲午上李鴻章書」，或稱「上李鴻章書」，或稱「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畫」，黨史會刊行的「國

父全集」則用「上李鴻章痛陳救國大計畫」（見「國父全集」第五集）。

關於國父上書李鴻章的經過情形，最初加以記述，也是記述得最詳盡的，是國父西醫書院同學陳少白先生所著「與中會革命史要」一書，書裏這樣說：「有一天，我在香港，他（指國父）在廣州，忽然藥房裏有信來，說：『孫先生失蹤了！藥房中開銷很難，收入不敷只贖十幾塊錢了。』我接到信，就到廣州去，替他維持店務。等了多天，一點消息都沒有，心裏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來了，手裏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東西。他見了我就說：『對不起！對不起！』我問他：『你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說：『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開他手裏的一卷紙給我，我拿起來一看，裏面乃是一篇上李鴻章書，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裏關起門來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隨便修改一下，以後，他對於藥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把這封信上給李鴻章。我沒有辦法，就讓他去，同時我就替他吧兩間藥房收拾起來，交回那些出過股本的人。孫先生到了上海，找

着了一個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鄭觀應（字陶齋），託他想方法見李鴻章。有一天，在陶齋家裏碰到一位太平天國的狀元王韜（號紫銓，別號天南遯叟），王韜曾到過香港助英國牧師滙博士 Dr. Legge 翻譯四書五經，滙博士同英國也請王韜同去，在英國住了幾年，後來回到香港，為循環日報主筆。再回上海來，聲名很盛，筆底對於世界智識，也很充分，並且他是和太平天國有關係的人。所以孫先生在陶齋家裏一見如故，就把他那篇大文章，同王韜商量起來，王韜也從新替他加以修正。這時候，王韜有一個朋友在李鴻章幕下當文案，王韜就寫了封信，介紹孫先生到天津，見這位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商量，或者可以見李鴻章。孫先生快樂極了，就到天津去見老夫子。那時候，剛剛中日大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至蘆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法到江海關去領了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孫先生所以要上李鴻章書，就因為李鴻章在當時算為識時務之大員，如果能够聽他的話，辦起來，也未嘗不可挽救當時的中國，豈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這時候，孫先生的志向益發堅決，在檀香山就積極籌備與中會，找人入會，一定要反抗滿清政府。大約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間，就正式成立與中會。」

其次是馮自由先生在「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中的記述：「癸巳（甲午前一年）十二月，孫總理因廣州東西藥局營業失敗，遂回翠亨鄉與家人團聚十餘日，始赴香港，及晤陳少白，乃出其在鄉所草上直隸李鴻章書稿，與陳少白斟字句，謂吾輩革命有二途：一為中央革命，一為地方革命。如此項條陳得李鴻章採納，則借此進身，可以實行中央革命，較地方革命為事半功倍，少白亦以為然。至甲午春，遂偕陸皓東買舟北上。……總理以其熟諳上海情形，邀之同行。既抵滬，暫寓三洋涇橋名利客棧。藉港友函介，分訪王韜、鄭觀應諸人。韜號紫銓，曾中太平天國狀元，洪秀全敗後，隱於香港，任循環日報主筆，別號「天南遯叟」。總理出示上李書稿，韜深為贊許，僅代修訂數語，並為函介於直督幕友羅豐祿、徐秋畦等。」

陳、馮兩先生對 國父上書李鴻章的經過情形，描述的歷歷如繪，其中雖略有出入，但事實大致相同，尤其下列數點，可供探證：第一、上李鴻章書是 國父由廣州回家鄉小住時所撰寫的。第二、書稿先後曾經陳（少白）、王（韜）兩位先生修正。第三、國父曾親攜這書稿到上海，設法投遞，在滬時曾晤王韜、鄭觀應諸人。第四、後來由王韜函介李鴻章的幕友，代為轉致。但李鴻章曾否看過該書？國父曾否與李會晤，則待查考。

三、是否出自 國父手筆？

陳馮兩先生的記述和上列各點，可以說對

國父上書李鴻章這件事，提供了佐證的資料，但其他許多有關的記述和看法，并不都表同意，而且大家的意見也各不相同。其中最值得我們研究的有三個問題：一是這篇上書李鴻章書是否國父親撰？二是此書如何投遞？國父曾否與李鴻章會晤？三是 國父上書的動機如何？

首先，陳馮兩先生雖記述這篇「上李鴻章書」是 國父在家鄉親撰，但也有入懷疑並非 國父親自撰寫，而是請人代筆，以己署名的。（見黨史會所存羅家倫毛筆原件之記載）引起懷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 國父生前著作和演說，都沒有明確地提及此書和上書這件事，雖然自傳中有「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的話，但不能據此即以認定；二則是這篇萬言書的內容，並沒有具體的提出改制共和，及排滿的主張，如承認此書是國父所為，則和 國父決志革命不符，恐會引起誤解。國父上書是在意圖向清廷進身，因而減損了 國父革命思想的一貫性。關於這一問題，前面所引陳少白先生記述 國父回鄉撰寫此書經過，既甚詳盡，且原稿又為他親見，應屬可信。不過，為了要研究此書是否親撰，不妨再將 國父遺教的其他文獻資料，和此書內容互相印證，看看是否同 國父的思想脈絡相一貫，便更可證明這篇萬言書是否國父的手筆。

我們先就 國父遺教本身的文獻資料來查證：國父在自傳（即「孫文學說」第八章）中說：「予乃與陸皓東北遊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這一段話，

國父雖然沒有把上書之事道出，可是在時間上與陳、馮兩先生之說却相吻合。

再有，國父在光緒二十三年（民前十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所著的「倫敦被難記」（原為英文本，此係引譯本，見「國父全書」（國防研究院印行頁三七四））有段對話，可以印證國父確實曾上書李鴻章。對話的內容是這樣的：「予（國父自稱）問曰：『汝前曾上策於總理衙門，（指清使人員）曰：『汝前曾上策於總理衙門，請其轉奏朝廷，汝策良佳；惟今者總理衙門急欲得汝，因令余暫相羈留，以待朝廷之命。』』」這段對話中，清使館人員所說「上策於總理衙門」，即是指上書李鴻章這件事。因為李鴻章當時是滿清政府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在那時不僅洋務、海防由他主持，就是對外交涉也常由他來擔任。所以清使以「總理衙門」代之，不直呼其名，實含有尊敬之意。總理衙門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簡稱，相當於今之外交部。

另外，在「倫敦被難記」（國父全集第六集）第一章也有這樣的記述：「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在改造中國，故名之曰『與中會』。其意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之不合於時勢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代舊式專制及腐敗的政治。予當時深表同情，即投身為黨員，自信固為國民福計耳。」又說：「中國匪夢至此，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與中會之所由設也，與中會所以偏重上書請願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

政府之或可奮起。」這段話是國父上書後三年，在英國倫敦所寫。文中所稱「與中會」係譯文，原文為（Young China Party），似非必指其後成立之與中會，惟值得注意的是，國父在文中提及「欲以和平手段，漸進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及「與中會所以偏重上書請願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的話，也可和他甲午年上書李鴻章這件事相印證。

其次，我們試從萬言書中的思想，來查證與國父往後的主張是否相一貫：國父在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即上書後一年）所發表的「創立農學會徵求同意書」（見「國父全集」第五集）與國父的「上李鴻章書」的思想脈絡，便是一貫的。「上李鴻章書」所條陳的四大綱領「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分析起來，很明顯的是本着「士、農、工、商」四民的職業來立論的。這種以民為本的理論，實與他在「農學會徵求同意書」中所說：「追求積弱之故，不得盡歸咎於廟廟之上，即舉國之士農工商，亦當自任其過焉。」的思想脈絡相一致，都是要求四民健全。再有「上書」中提倡四民應成立各種學會學報，他說：「逮至學成名立之餘，出而用世，則又有學會以資其博，學報以進其益，萃全國學者之能，日稽考於古人之所已知，推求乎今人之所不逮，翻陳出新，開世人無限之靈機，闢天地無窮之奧理，則士處其間，豈復有孤陋寡聞者哉？」這和他在「農學會徵求同意書」中所說：「蓋中華以士

為四民之首，此外則不列於儒林矣，而泰西諸國則不然，以士類而貫四民，農夫也有講耕植之會，工匠也有講求製器之會，商賈也有講求貿易之會，皆能闡明新法，著書立說，各擅專門，則稱之曰農士、工士、商士，亦非溢美之詞，以視我國之農僅為農，工僅為工，商僅為商者，相去奚啻霄壤哉？故欲我國轉弱為強，反衰為盛，必俟學校振興，家絃戶誦，無民非士，無士非民，而後可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馳騁於地球之上。」可見兩書之主張相符。尤其從他創立農學會的實際行動中，更可體會他重視農桑大政的積極意義。

再從兩書批評洋務的見解來看。「上書」中說：「竊嘗深維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此四事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我國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船堅礮利之是務，是捨本而圖末也。」而「農學會徵求同意書」則說：「若沾沾焉以練兵製械為自強計，是徒襲人之皮毛而未顧己之命脈也，惡可乎？」比照之下，詞意一致，僅用語不同而已。

又國父倡「知難行易」的學說，在「上書」中已見其端倪。「上書」中說：「夫天下之事，不患不能行，而患無行之人。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可見我國之所以積弱不振。實因力「行」的人少，而且無「知」的人也多。無知的人多，所以國父主張施教以求知；力行的人少，所以國父提倡

講求鼓勵之方。蓋天下之事，不怕不能成，最怕是不去行。因此「國父特倡「知難行易」之說，要糾正國人數千年「知之非艱，行之維艱」的錯誤觀念，使國人不僅要重視「知」，而且也要重視「行」。

國父在「孫文學說」中，亦曾就才智方面分世人為三系，即「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而這篇「上書」中亦有「且人之才智不一」的話，都是承認人類才智有高下之分。

最後從這篇「上書」的四大救國綱領與國父建國方略的「實業計畫」相比照，便可發覺「上書」中的四大綱領與「實業計畫」的農工商礦交通運輸等建設相同，都是在發展實業的。



陳少白晚年的照相，少白係國父青年時代的同學好友，國父上李鴻章書稿曾與少白商榷字句。

陳少白署名春明過客所寫之墨蹟

大好河山認作尋常路一燈
臨便又欲歸去今日再來景
物全非祇存何處欲求難留
款言難接非細室前番語
重柳此際兩如絲長言三息
聽之料應最任人間講愛聽
對墳鬼唱詩 春明過客有餘白

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中也說：「

由上所述，這篇「上李鴻章書」為國父所親撰，可說是信而有徵了。此外，還有人認為這篇國父上李鴻章書稿，既經陳、王兩先生的修改，恐怕已失國父原意。但是根據陳先生自己說，只是隨便修改一下，可見陳少白先生僅是字句的修正而已。至於王韜是否可能竄改國父書稿的原意？我們知道王氏雖是太平天國的狀況，但一向具有新思想新見解，而且極力倡導改革時政。他學貫中西，見識廣博，曾著「破園文集」，他於一八二六六年上書李秀成的部將詳論攻取上海及對付洋人的策略。（參閱「大陸雜誌史學叢書」第一輯第七冊，二六四頁）對日本倣效歐美亦甚為讚許，因此企盼中國也應像日本一樣，急需改變「取士、練兵、學校、律例」四種舊制。他在洋務方面也曾批評說「其只能為民禍，不能為民福；能為民害，不能為民利」，可見他的見解與國父重視民生的理論是相融的，因此可說他的修改，是不致會改變

國父的本意。然而國父為何要請他們兩位修正？筆者認為國父一方面是由於謙虛，肯博採別人的意見（參閱吳稚暉「總理行誼」），另一方面也因他不是科第出身，對官書較感生疏，恐有語氣不妥，或程式不符之虞，於是請他們修改作文字上的潤飾而已。

四、投函經過和 國父會

否會晤李鴻章

其次，談到這篇萬言書如何投遞和國父會否與李鴻章會晤的問題。有人說，此書是國父在國外郵寄的；吳稚暉先生在其「中山先生年系」中便說：「是年（甲午年）七月一日中日開始宣戰。自傳曰：『至甲午中東戰起，以為時機可乘，乃赴檀島美洲』出洋後郵上李鴻章一書。所以知其郵上者，因書中有『文於回華後……』云云也。郵書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萬國公報已登該書矣。」因此斷定為甲午年八月在國外郵寄。但鄒海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史稿」中，即否定其說，他說：「蓋國父遊天津時，係由徐秋畦介紹見李而上書的，故中有『文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句。若出洋後，當無此言。且是年係往美洲，尤不作此言。」吳稚暉先生後來在「總理行誼」（民國廿八年在

他（國父）上書李鴻章，並不望李能替滿清實行。他是借此試探北方的究竟，且偕同志陸皓東同去，使他親自看見北方的腐敗情形，絕他們仰賴滿清的希望。」可見他後來對郵寄之說已有修正。因此，我們相信這萬言書是 國父偕陸皓東攜

書北上，經由王韜函介，託李鴻章幕下投送的。但王韜函介給李鴻章幕下的，究是何人呢？其說不一，據鄒海濱先生所著「中國國民黨史稿」說是由清總理衙門委員徐秋畦介紹見李鴻章而上書。其中關於徐秋畦是否係由王韜直接函介的人，

則未論及。根據陳少白先生的說法是王韜介紹國父到天津見李鴻章幕下的老夫子，至於老夫子為何人，陳氏並無指名。據馮自由先生則說是函介於直督幕友羅豐祿、徐秋畦等。我們綜合有關資料來看，相信 國父由王韜函介於李鴻章幕下

當文案參贊羅豐祿，較有可能。國父於一八九四年六月偕陸皓東由上海抵天津，即逕訪直督幕僚羅豐祿，羅氏見後，甚表願予贊助。惟當時李鴻章因中日朝鮮問題，忙於對外交涉，因而羅氏託請任職於總理衙門委員徐秋畦，代為呈遞此書，並報請李鴻章接見 國父，似較合理。

自然，最重要的，還是 國父曾否會晤李鴻章的問題。對這一問題，有肯定說，也有否定說。認為 國父曾會晤李鴻章的有：「別傳」所云：「中日交戰前，先生由湖南出揚子江，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險晤李鴻章於私邸，陳說大計，勸李革命，李以年考辭。」但吳稚暉先生在「中山先生年系」中却否定「別傳」的說法。他說：「此書首言『竊文籍隸粵東，世居香邑，曾於香

港考授英國醫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於私邸，必不作此開端。則別傳冒險晤李之說，必係傳聞之誤。」（錄自「吳稚暉全集」第五冊「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

另一主張 國父曾晤李鴻章的，是上海「時事新報」所編「中國革命史記」說：「國父至北京時，冒險謁李鴻章，密陳北京政府之橫暴腐敗，革命之不可緩，議論雄決。李謝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精力既衰，斷不能大有為，幸君努力為之，中國前途，惟君等是賴，余必為後援』云云。」這也是認為 國父曾

晤李鴻章的。羅家倫所編「國父年譜」對上面二說，均予否定。他說：「二說皆稱先生（國父）冒險晤李鴻章，勸其革命，揆諸當時局勢，恐無此可能。」

根據陳少白先生的記述：「那時候，適值中日甲午之戰，打得很厲害，李鴻章到蘆台督師，軍書旁午，老夫子把孫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鴻章那邊去，李鴻章是否看過，就不得而知了。不過後來李鴻章說：『打仗完了以後再見吧！』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此說當較為可靠。吳相湘先生在「孫逸仙先生」一書中也說：「滿懷熱望北上的孫先生並沒有能見到李鴻章。他的這一萬言書自然也沒有獲得李的注意，這是由於當時中日朝鮮問題日趨緊張，李鴻章忙於外交肆應及部署戰守，實在沒有餘暇顧及其他。」（見吳著「孫逸仙先生」第一冊，九六頁）足證 國父未與李鴻章會晤，殆屬定論。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其後 國父出國是否由李鴻章發給護照？鄒海濱先生的「黨史稿」曾說：「李鴻章對於 總理之書至為贊許。並予以農桑學會籌款護照。然無革命之信念，復無洞燭大局之眼光。且年已垂暮，無意事業。總理知不能使之大有作為。值清軍疊敗於日，內外威信掃地，總理以時機可乘，乃赴檀香山創立興中會。」海濱先生的說法，可能根據 國父「上書

」中：「今年擬有法國之行，從遊其國之蠶學名家，考究蠶桑新法，以興農政，冀李氏有以玉成之語，而認定李氏贊助其行，乃發給農桑會籌款護照。另據羅家倫先生編的「國父年譜」：說「鴻章雖甚贊許，然其時中日間戰雲密布，無改革之意圖，迄未接談。惟因羅、徐關說，為發農桑會籌款護照一紙。」也認為李鴻章只開過「上書」，並未會晤國父，且經羅、徐關說，發給

國父農桑會籌款護照一紙。

但據陳少白先生的說法：「……孫先生聽了這句話，知道沒有辦法，悶悶不樂的回到上海。陶齋看見了，就替他想法到江海關去領一張護照，請他出國去設法。孫先生也就乘輪到檀香山去了。」陳氏認為 國父未晤李氏，而且也非由李氏給與護照。（下期續完）

黎元洪傳

章君毅著定價參拾元

本書將黎元洪之一生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